

江阴名贤文化丛书 第一辑

江阴市档案局

策划

江阴市暨阳名贤研究院

JIANG
YIN
SHI
BIAN

江 阴 事 变

王荣方
著

大学出版社



江阴名贤文化丛书 第一辑

江阴市档案局

策划

江阴市暨阳名贤研究院

JIANG
YIN
SHI
BIAN

江阴事变

王荣方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阴事变 / 王荣方著. — 苏州 :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8. 8

(江阴名贤文化丛书 / 张伟主编. 第一辑)

ISBN 978-7-5672-2558-9

I. ①江… II. ①王… III. ①抗清斗争—江阴—
1645 IV. ①K249.2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3852号

江阴名贤文化丛书 第一辑

策 划: 江阴市档案局
江阴市暨阳名贤研究院

书 名: 江阴事变

著 者: 王荣方

责任编辑: 倪浩文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 编: 215006

印 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网 址: www.sudapress.com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7481020

开 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30千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2558-9

定 价: 55.00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 0512-67481020

编 委 会

名誉主任：程 政 许 晨

主 任：张 伟

副 主 任：蒋国良

主 编：张 伟

执行主编：蒋国良

副 主 编：李孜渊 徐泉法

编 委：张 伟 蒋国良 徐泉法

李孜渊 单 旭 许建国

陆正源

总 序

江阴，古称暨阳，因地处大江南岸而得名，是一个拥有约7000年人文史、5000年文明史、3800年筑城史、2500年文字记载史的江南古城，在约5000年前，就成为前太湖西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

南宋江阴籍左丞相葛邲曾对人杰地灵的江阴有过这样的评说：“得山川之助，故其人秀而多文；有淮楚之风，故其人愿而循理。”从古至今，江阴一直为世人瞩目。

曾经因“南龙之末端”“江尾海头”的独特地理位置，使江阴早在殷商时代就出现了江南地区最早的城池和公共建筑。泰伯奔吴，筑城于江阴左近；季札分封延陵；后又成楚国春申君黄歇采邑；江阴史称“延陵古邑”“春申旧封”。吴文化和楚文化在江阴的交织，构成了江阴独特的地域文化，让江阴成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

北宋王安石考察江阴曾留下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黄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当时的江阴与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着贸易往来，其繁华程度称雄江南。

历史沧桑变化，社会兴衰治乱。“锁航要塞”的江防地位，使江阴历经战乱，江阴城一损于元，二劫于倭，三伤于清，又毁于日侵战火。城内有宋建“兴国古塔”，直奉大战时被炮火削去塔顶，虽历经千年而仍岿然屹立。这是江阴古城的标志，也是江阴文化传承的象征。江阴古城南北两门曾悬挂门额，南称“忠义之邦”，北名“仁让古邑”，这是江阴文化浓缩的精华，它闻名于世，传承不衰。江阴无数仁人志士在以忠义为特质的江阴文化感召下，崇学厚德，忠义守信，开放争先，创造出令人瞩目的业绩。季子为江阴开创了仁让文化的源头；八十一天守城抗清为江阴博得“忠义之邦”的英名；徐霞客

集江阴文化之大成，带江阴文化走向世界。历史走到今天，更有吴仁宝、俞敏洪这样的江阴名人，传承弘扬江阴文化于中华大地。

研究乡邦历史，传承名贤精神，弘扬江阴文化，是行世二十余年的江阴市暨阳名贤研究院的立院宗旨，在已整理出版两千余万字江阴文化的基础上，又着手精编“江阴名贤文化丛书”，欲使江阴乡邦文化的整理研究更上层楼，为江阴文化的传承再献佳作。这是一项立足长远的文化工程，幸逢习近平同志近年多次倡导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得江阴市档案局财政支持，双方愿努力合作，发挥名贤研究院众多人才作用，编撰出更多更好更贴近江阴地方特色的文化丛书，为江阴文化增添光彩，更为我们的后人钩沉史实，留下传承辉光。

蒋国良

2018年6月

1645（乙酉）年，江阴因抵制清朝政府的“剃发令”，不肯剃发，自发地揭竿而起，凭恃坚固的城防，守城抗清八十一天，惊动了朝廷，进而清朝派遣重兵围攻。这在明末清初的江南是有着重大影响的政治和军事事件，故称其为“江阴事变”。

——题记

前言

我一直想写一本关于江阴的书，江阴人看了，能更理性地认识自己，从而丢掉历史包袱，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其他读者读了，也能从中照见他邑的过往，反思总结，更好地走向未来。

促使我写一本关于江阴的书的诱因，就是江阴人说话为什么那么“冲”，一开口喉咙就亢亢（古音读gāng gāng）响，像跟人吵架似的。这个问题萦绕于我心数十年了，我一直在努力弄明白这个问题。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我会揪住不放，因为有一件事给我的刺激很大。

1975年“双抢”大忙过后的一天下午，我村有个女孩子，在母亲陪伴下，跟着介绍人，来到江阴西郊一家人家相亲。按照习俗，如果男女双方看中意的，男方要留女方和介绍人吃点点心的。下午3点多钟，男方高兴地准备留女方吃点心，出于礼貌，就征求女方和介绍人意见：“你们要吃到咯。”本来喜形于色的女方，突然听男方说“要吃刀咯”，就吓坏了，脸色立马变得很难看，并匆忙站起来说：“我们从来勿吃刀咯。”男方一头雾水，不知道女方为什么突然变卦，说走就走，那桩亲事就黄了。事后女方传出话来，说：“我女儿还无过门，男方就要让我女儿吃刀。若过门了，那日子还怎么过？”后来女方又传出话来，说“懊悔死了，就为了一句土话，结果黄了一门好亲事”。其实，江阴西郊（包括江阴城里）人说的“吃到咯”是“吃什么”的意思，可当时江阴西乡人听不懂江阴西郊人的土话，误认为是“吃刀咯”。好笑吧？不那么好笑。

土话说，江阴人说话“冲”，但从语言学上说，江阴人说话声中是阳上声调多，浊音声韵多，也就是古声调、古声韵多，且还间杂着江淮话，因而具有干脆利落、高亢有力的特点，而不是“冲”。

有的说，江阴人说话之所以高亢有力，是因为吃了翻跟头的长江水。粗想想似乎有道理——江阴就坐落在长江南岸边。然细想想并没有道理，因为吃长江水的不止江阴一个地方，为什么唯独江阴人说话“高亢有力”？再说，历史上除船家外，住在陆地上的江阴人，大多吃的是井水或内河水。

有的说，江阴人说话为什么大嗓门、亢亢响，是与东晋、南宋南渡有关。这是中国历史上从北方向江南的两次人口大迁徙。大批北人落地江阴，生息繁衍，与江阴原住民通婚，使生物性遗传基因发生变化，使江阴新生代渗入了北人的基因，因而说话中留有古声调，且间杂江淮话。可这说法也没有说服力，因为东晋、南宋南渡的人口，不全落户在江阴呀，其他地方多了去了，为什么其他地方的人说话不“亢亢响”呢？

根据我对江阴历史的研究心得，江阴人说话之所以会“亢亢响”，与三个方面紧密关联：一是江阴曾为“春申旧封”之地。战国晚期，楚国的黄歇被考烈王任命为令尹（为楚国执掌军队大权的最高官职，相当于后来封建朝代的宰相），封为春申君，受赐淮北地十二个县。后来楚王又将黄歇的封地淮北改封为吴地，这样江阴就成为“吴头楚尾”，成为荆楚文化与吴文化相互通融的前沿。黄歇受封吴地十年间，不仅在江阴开挖了申港河、黄田港，筑地造田，垒建城郭，还把先进的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带到江阴，发展了江阴的农业生产力，而且把楚国的文化特别是习俗带到江阴。再加上楚人与江阴人的通婚，本是“蛮夷”的江阴人与民风彪悍的楚人相融合，使得江阴人的发音中融入了楚语的元素。这“楚风”对江阴影响持久、深广。二是到了北宋，江阴水上交通便捷，江阴商品经济发达，江阴黄田港口繁荣，使江阴成为江南地区有名的纺织中心和商贸中心，吸引了江淮、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地的行商汇聚江阴，站稳脚跟后就变为坐商，开始与江阴人通婚，并随着行商—坐商—通婚的不断循环，不仅促进了江阴商贸的繁荣，而且把“亢亢”之声融合进了江阴人的血脉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使得江阴人说话有别于糯软的纯粹吴语。三是与明代的军事制度卫所制密切相关。卫所制始于洪武时期。卫所制规定：凡

是卫所军人，便世代为军，其家属也随军。同时卫所制还规定，南方兵戍卫北方，北方兵戍卫南方。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后，就封吴良为江阴侯，封吴祯为靖海侯，总领江阴等四个卫所，辖兵两万两千四百人。这些军人是世袭的，且是固定在一个地方不太会被调动走的，这就使得这些北方卫所兵与江阴本地人通婚，渐渐融合为江阴人。据《明史》和嘉靖《江阴县志》记载，明清时期江阴大姓江阴来昭陈氏与江阴沙氏，就是江阴二侯吴良、吴祯世家：江阴来昭陈氏始祖陈清，北方人，是吴良的女婿；江阴沙氏始祖沙原德，是从苏北江都来协助“江阴二侯”的副将。明朝历代皇帝均重视江阴要塞的防御与建设。崇祯八年（1635）在江阴置游巡营，并在江阴黄山大小石湾修筑炮堤，配置红夷火炮百余门；十七年（1644）年初，又在江阴黄田港置参将营。在明朝的二百七十多年中，这些卫所军人与江阴本地人通婚后，要繁衍多少人口？会多大程度上改变江阴人的口音？

我这一家之言，或许并不十分准确，还望大家指正；但我以为是比较站得住脚的。这是江阴的特殊性。江阴的这一特殊性，就使得同属吴语区的江阴人，说话是那么“亢亢响”的。当然，这里说的江阴人，主要是指江阴城及其周围附近地区的人。江阴东乡诸镇人们的口音接近常熟人口音，南乡诸镇人们的口音接近无锡人口音，江阴西乡诸镇人们的口音接近常州人口音，沿江一带上了岁数的人们大多说的是江淮话。

如今的通识是，江阴人说话“亢亢响”，是因为江阴民性刚烈，是因为江阴人“忠义”，其主要论据是1645年发生的“江阴事变”。其实不然。我从事江阴史志工作二十多年，可以说，我对“江阴事变”这一历史事件，关注、研究了二十多年。我常常思考“江阴事变”究竟是一件什么性质的历史事件。2011年第3期《无锡史志》发表了 my 研究“江阴事变”的一万五千余字的文章《乙酉江阴之变祭》，网上点击人数逾万，引用我文章中的新观点的博文也不少。是年起，我因所谓的“退居二线”，没有多少工作任务，有时间和精力集中研究“江

阴事变”了。2016年10月退休后，我就着手构思写作《江阴事变》。

我是一名史志工作者。我写作《江阴事变》时，坚持修史两大要旨，尽管这部书不是历史学著作，但我力求做到：一是辨别是非，努力使前代不白之冤予以昭雪，如对夏维新的客观评价；努力使前代未著之奸加以锄铤，如对明末秀才劣迹的批判，不把史作为酬应舞文的工具，而是一秉大公，“发潜德之幽光”。二是破除忌讳，言不敢言者，褒贬予夺，也是一秉大公。

从史料学角度而言，清代至今有关书籍与文章中记载的“江阴事变”的内容，严格地讲，绝大多数还算不上史料，仅是资料而已。这些资料大多是单一地孤立地记述“江阴抗清八十一天”，缺乏前因后果的完整记述，来龙去脉不甚清晰；而且大多是大而化之、统而括之的记述，缺乏历史细节，缺乏对史料的新阐释，缺乏大历史的视野，更缺乏对人、对人伦、对人性的书写。《江阴事变》则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多角度、多方位，努力地具体记述“江阴事变”发生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诱因、过程、结果，注重历史细节，注重对史料真伪的辨别与考证，努力还原历史场景，照亮现实，美好未来；注重对史料进行阐释，以揭示史实的真相，洞悉历史的真理，努力寻找、发现和呈现能推动民族、国家和人民的进步，有利于民族、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那部分历史。

我又是一位作家，更有责任从文学的立场来记述“江阴事变”。文学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刺破谎言或迷思，以情感、理性和审美的力量，揭去生活中本以为如此却毫不自知的一切表象。我在写作《江阴事变》的过程中，在坚持历史真实的同时，努力呈现艺术真实，即努力写出历史的可能性，写出人在特定历史年代中的可能性，并带有一定的批判性。

《江阴事变》是一部历史文学作品。历史文学有两个意思：一是指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如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二是指真实的历史记载所具有的文学性表达。《江阴事变》体现的是历史文学的第二个意思。所以，在这种定位下，《江阴事变》努力地

将史学与文学进行融合，努力体现其文学性、学术性、知识性、思辨性和可读性。

自江阴人张佳图于1646年左右第一个撰写反映江阴抗清八十一天 的《江阴节义略》起，以后的文人们或为尊者讳，或为名人遮，或为君上避，或为时政忌，或因史料缺乏，或出于个人的感情，或由于我们无法知道的原因，往往掩饰了一些历史细节和历史本相。

《江阴事变》与其他记述江阴抗清八十一天 的著作或文章相比，有着些许不同的味道，可能会颠覆一些人根深蒂固的认知。我不是在标新立异，也不是在跟谁过不去。我只想追索史实和真相，明述于世，不文过饰非，而是实事求是；不受明清时期“八股文”的思想影响，独立思考，对江阴抗清八十一天 这段历史的再认识，这是我分内的事，也是我的责任和使命。同时也是在为江阴历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做一些探索，无论效果怎样，都是符合中共十九大精神的。

《江阴事变》是一部直面江阴抗清八十一天 这一历史事件的书，是我的一家之言，其中差错和失误也许会有不少，每念及此，不禁诚惶诚恐，敬望读者对我进行学术性的批评指正。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江阴民乱四起	1
第二章 江阴士绅欲勤王	14
第三章 主要官员弃职而去	25
第四章 方亨严饬剃发	38
第五章 许用首倡守城	51
第六章 江阴揭竿抗清	65
第七章 常州府遣兵收江阴	78
第八章 刘良佐劝降	92
第九章 阎应元接任主帅	104
第十章 阎应元诈降	116
第十一章 刘良佐再次劝降	129
第十二章 贝勒博洛初战未捷	140
第十三章 贝勒博洛无奈议和	152
第十四章 清军屠城三日	163
第十五章 阎应元等主将的结局	177
第十六章 难以抹去的痛	189
第十七章 “文烈”黄毓祺	204
第十八章 历史的书写和评价	217
后 语	239
主要参考文献	245

第一章 江阴民乱四起

朱由检很想做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抱负很大，企图中兴大明。理想很丰满，无奈现实很骨感。在苦撑大明危局十六七年后，大明王朝终于亡在了他手里，尽管他不甘心地发出了“朕非亡国之君”的千古浩叹，但他终究是朱家的败家子、不肖孙。大明亡，不仅仅因为是“诸臣误朕”，更因为是人祸滔天，“致逆贼（李自成农民军）直逼京师”，而且连老天都不给他面子，老打他的脸，灾害频仍，民不聊生。作为真命天子的崇祯皇帝，连老天都不帮他，都不助他，他也唯有死路一条了。崇祯皇帝死，大明亡，有其必然性。

就拿江阴来说，在崇祯年间，也是天灾不断，怪异频发。

崇祯在位十七年，江阴每年都有灾害，不是干旱、水涝，就是风害、雪灾，还有虫灾。大凡干旱年，都是五月至七月不下雨，田中禾苗枯死；大凡水涝年，都是六月至八月，淫雨肆虐，伴之狂风，致使江岸河堤决口，农田汪洋，房屋倒塌，秋收无望。崇祯五年（1632）、十二年（1639），旱情特别严重，两三个月不下一滴雨，致使米价暴涨，一担米价为三两白银（正常年景的米价大抵每担白银三至五钱），因而“民饥疫死者载道”，急得知县、学政、海防等率领部下，一步一叩拜，步祷老天降雨。可老天就是无情，仍不下雨。崇祯十一年（1638），江阴的蝗灾特别严重，“蝗飞蔽天”，知县冯士仁出钱购捕蝗虫，每石蝗虫给钱三百，共购捕蝗虫三百石，仍“不能绝”，蝗虫还是把禾豆、青草、树叶，吃得干干净净，“原野成空”。

此外，还怪异频发，搞得百姓人心惶惶，寝食难安。崇祯二年（1629）五月中旬，江阴县城上空连续数天响起一种从未听到过的怪

异骇人的声音，吓得男人六神无主，吓得女人胆战心惊，吓得孩子号哭不止。十年（1637）中秋前后数天，“旦晚赤气弥天，月色亦赤”。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夜雨小黑豆”；四月下旬数日，从早到晚，许许多多不知名的虫，“聚鸣于天”；六月下大雨，从天上落下了像红赤豆似的东西；八月发生老虎伤人的事件，这是江阴历史上第一次发生老虎伤人的事件，次年八月，又发生老虎伤人事件。十五年（1642）春，有一种外形不大、发出来的声音像孩子哭声的鸟，名叫河鸟——江阴以前没有这种鸟——突然飞到江阴县城上空，盘桓数日，哀鸣不息。人们放炮仗，燃鞭炮，欲驱赶河鸟，可河鸟丝毫不惊。有一天早晨，早早起床的知县李令晰，站在县衙门口，听着河鸟的哀鸣声，不禁叹息：“此城将有兵祸矣。”不料，李令晰一语成谶，三年后江阴真的发生了“兵祸”。十六年（1643）冬的一天，江阴县城里的居民一早起来开门，都发现自家大门上，不是被画了个黑圈，就是被画上了一枝梅，但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议论纷纷。议论过后，人们感到害怕，是一种什么样的怕，又说不清楚。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夜，“月赤如血”。好奇的年轻人登上城墙，观看如血的赤月。老年人则是沉默不语，心事重重，唉声叹气，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他们不知道，第二天，亦即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吊死在了煤山（今景山）的一棵树上。

对于自然灾害的发生，人们大多相信，因为它们频发，有的如地震会周期性地发生，但带有神秘色彩的罕见的反常怪异之事的发生，尽管有的史籍上有记载，有的口口相传，但后人还是会将信将疑的，因为它们不经常发生，有的甚至发生过一次后永远不再发生了。无论是信还是不信，中国人自古以来都很看重怪异之事的发生，因为它往往预兆着天大的事即将发生。

——比如，从小时候起，我不知听村上的耆老讲过多少次，也听父母讲过几次，他们说1949年4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耆老称为新四军过江）前夕，村上家家门前的打谷场上出现黑猪毛。不仅是我们一个村，而且是很多村上到处能见到猪毛。耆老说，地上出现猪

毛是从未有过的事，非常怪异。结果，没过几天，朱（德）毛（泽东）的部队打过长江来了，消灭了蒋匪帮，改朝换代了，由民国变成了新中国。年轻时，每次听耆老说这件事，总是不相信，认为那是封建迷信，是唯心主义。可就在我动笔写此书之前的一天晚上，我陪八十八岁的老母亲喝酒时，不知为什么又提起了“猪毛”的事。母亲说，确有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年阴历三月二十二日（公历4月19日），是我跟你父亲结婚的日子。第三天，是我跟你父亲结婚后的“三回门”，去了你舅家。那晚九十点钟起，江北江南的大炮声一直响到天亮，炮声震得房屋都在摇晃。我和你父亲吓得躲到床底下。第二天天亮炮声停后，村上的人才敢开门。我们看到了一长队穿黄衣服的队伍从我们村东头，由北向南远去。我相信母亲说的是真的。我也因此相信村上耆老讲的出现“猪毛”怪异之事也是真的，尽管我找不到科学依据，也找不到有关的史料记载。

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日，三十三岁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死了。死法，自己用一根绳子吊死在北京煤山的一棵树上。死因，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于三月十七日打到了北京城下，朱由检无处可逃，又不愿被李自成擒获，只得自己了结自己的性命。崇祯皇帝的死，标志着明朝的灭亡。

17世纪40年代，资讯传递很慢。在崇祯皇帝死后第四十天的夜晚，亦即农历四月二十九日的晚上，其“凶闻”才传到江阴。那么，江阴人知道崇祯皇帝已死、大明王朝已亡的消息后，有怎样的反应呢？是万众恸哭地哀悼崇祯皇帝？不是。老百姓才不关心崇祯皇帝的死活呢，只关心自己的日子怎么过下去，怎么过得好。哪个皇帝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就是好皇帝。既然崇祯皇帝在位期间，江阴自然灾害不断，并且怪事一桩接一桩地发生，没让百姓安生过一天，所以，崇祯皇帝死也好活亦罢，百姓才不关心呢。

崇祯皇帝“凶闻”传到江阴城乡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是士人的满腔悲愤，比如江阴儒学训导冯敦厚的哭且骂“满朝庸奴，误我皇上”；比如诸生许用痛哭流涕，不思寝食；比如贡生黄毓

祺哭得咯血，并和其他复社成员一道为崇祯蹈海，但没死成。在士人看来，大明灭亡，责任全在“庸奴”，皇帝朱由检没半点责任。另一种是江阴各乡的一些佃农，纠集无地的贫农，乘改朝换代之机，冲进佃主家，抢财物，索田契，焚烧房屋。同时，江盗、河盗成群结队，无论昼夜，乘乱抢劫市镇商户、农村地主家的财物，如有反抗，一律斩杀，而且“杀人如割草”。江阴农村处于极度无序的动乱之中，并波及江阴县城。

面对动乱局面，担任江阴知县不满三个月的林之驥（福建莆田人，进士，听不懂江阴话，人们戏称他为“林木瓜”）一筹莫展，不知道如何来处置眼前突然发生的乱局，一点应急预案也没有，只得自己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两天鼻子。但哭解决不了问题，他是一县之主，必须面对现实，必须解决眼前发生的暴乱，而他并不是一个经国之材。

林之驥主持召开了一个维护社会稳定的联席会议，县丞、县主簿、县典史、县儒学教谕、驻节江阴的学政、驻防江阴的军队指挥官等出席会议。会上没一个人吭声，大家各自在心里打着小算盘。在这“天崩地解”之际，他们看不清来去方向，心里只想着如何保护好自己和全家人的性命，谁还有闲心思去管江阴的社会治安？再说，他们一个个都不是江阴人。江阴人是死是活，与他们何干？

林之驥见大家一言不发，自己又提不出什么好办法，无奈之下，只得宣布散会。散会后，林之驥去找了县儒学训导冯敦厚：冯老，帮帮我。林之驥把联席会议上自始至终的正常又不正常的冷场情况讲给冯敦厚听。听完，年逾花甲的冯敦厚站起，恭敬地说：林知县，你莫急。我来想想办法。

在这危急关头，冯敦厚站起来了，牵头成立了由县城士绅中有声望者组成的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队，分四个小组急赴各乡“宣谕”。江阴县城东北方向的沿江一带，由县儒学教谕许晋、诸生陈明时负责；东乡由县儒学训导徐廷选、贡生章经世负责；西乡由冯敦厚、诸生吴幼学负责；南乡由士绅汤澄心、诸生张鼎泰负责。这四个工作小组通